

要 目

- 孙中山与四川辛亥革命
- 记顾颉刚先生主编的《文史杂志》
- 忆蒙文通与汤用彤
- 回忆柳亚子先生
——从台湾旧友来信谈起
- 张澜祭刘湘文
- 戊戌变法侧记
- 版画在四川的发展
- 访日讲学记

文 史 雜 誌

1

1985



介石先生鑒：
 恩來同志回延安稱述先生盛德，欽佩無餘。先生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人無不崇拜。十五個月之抗戰，愈挫愈奮，再接再厲，雖頑寇尚未戢其兇鋒，然勝利之始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無窮。此次，敝黨中央六次全會，一致認為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此階段之特點，將是一方面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面必更加進步，而其任務在於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在此過程中，敵人必利用歐洲事變與吾國弱點，策動各種不利於全國統一團結之破壞陰謀。因此，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之進攻，準備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漢緊張，故欲恩來同志不待會議完畢，即行返漢，晉謁先生，商承一切，未盡之意，概托恩來面陳。此時此際，國共兩黨，休戚與共，亦即長期戰爭與長期團結之重要關節。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兇頑，終必失敗；而我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終必能於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逐頑寇，而使自己雄立於東亞。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專此佈臆。敬祝健康！並致民族革命之禮

毛澤東謹啓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錄 文

介石先生惠鑒：

恩來同志回延安稱述先生盛德，欽佩無餘。先生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人無不崇拜。十五個月之抗戰，愈挫愈奮，再接再厲，雖頑寇尚未戢其兇鋒，然勝利之始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無窮。此次，敝黨中央六次全會，一致認為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此階段之特點，將是一方面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面必更加進步，而其任務在於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在此過程中，敵人必利用歐洲事變與吾國弱點，策動各種不利於全國統一團結之破壞陰謀。因此，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之進攻，準備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漢緊張，故欲恩來同志不待會議完畢，即行返漢，晉謁先生，商承一切，未盡之意，概托恩來面陳。此時此際，國共兩黨，休戚與共，亦即長期戰爭與長期團結之重要關節。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兇頑，終必失敗；而我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終必能於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逐頑寇，而使自己雄立於東亞。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專此佈臆。敬祝健康！並致民族革命之禮

毛澤東謹啓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抗日战争中，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1938年9月武汉危急，为争取蒋介石坚持抗战，29日毛泽东写了致蒋介石亲笔信，由周恩来从西安飞赴汉口亲交。

文史雜誌

創刊號

1985年7月30日出版

四川省文史研究館主辦

	發刊詞	張秀熟	3
人物春秋	孫中山與四川辛亥革命	陳瀛濤	4
	老教育家陶行知	龔思雪	7
	記顧頤剛先生主編的《文史雜誌》	方詩銘	10
海峽兩岸	憶蒙文通與湯用彤	錢穆	12
	回憶柳亞子先生		
	——從台灣舊友來信談起	金紹先	16
	柳亞子與二十二個社會團體	黃清華	14
抗戰八年	抗戰中的晉察冀軍區	劉建泉	18
	張瀾祭劉湘文	陳雁羣提供	21
	抗戰捐軀的川軍四將領	吳嘉陵	22
千秋功過	戊戌變法側記	許姬侍	27
青年園地	崇禎皇帝與西方科技	李明偉	32
	西漢戰勝匈奴的重要措施——養口	郭岳	35
	原始農業與我國	冉光瑜	34
文史探索	巫師、方士與《	任乃強	36
	李冰·文翁·	陶元甘	37
詩	漁父辭劍（劇）	楚補訂	42
賦	衣上新月和雁	胡鴻經	39
詞	宋育仁與《庚子	徐溥	40
曲	《金元明清詞選	趙家怡	24

新集文

1981年5月出版

—— 作者姓名按文首排列

书 法 绘 画	版画在四川的发展	丰中铁	14
	徐悲鸿对中国画的创新	屈义林	17
	中国山水画技法简谈(上)	赵完璧	49
	论书与画的异同	梁荫本	52
论 语 说 文	为子路辨诬	徐仁甫	54
	访日讲学记(一)	王利器	55
	汉字杂谈	李仲琦	63
文 化 典 制	宋代中央官署、官职简介	朱端熙	56
	清朝皇帝的师傅	无闻	58
	旧中国制宪史上的闹剧	夏潮	60
巴 蜀 述 闻	青羊宫杂记	吴鼎南	62
	凉山游记(一)	程溯洛	59
	编后致读者		64
封 二	抗日战争中,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亲笔信		
封 三	墨梅 书法 印选	黄佩荃 谢无量 余中英	
封 底	幽兰	郑板桥	

发 刊 词

张秀熟

《文史杂志》即将出版，主编同志要我写一篇序言，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出版这一刊物是我多年来所渴望的。

旷观世界，所有国家民族，虽有先进与落后发展的程度不同，但都各有自己的文、史。通过战争，通过商品往还，通过文化交流，优胜劣败，升沉起伏，也就各自循着一定的途径，向前发展。在时代不断前进的主流所制约的共通性中，又各自或多或少保存其源远流长的特殊性，相互吐故纳新，渗透融合，整个社会就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宏观。因此，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无不重视自己的文、史，而每个亡人之国的暴敌，无不首先以亡人之文、史，以为其扎根深固的征服手段。这一盛衰起伏，往往绵亘至数百年。中国真是世界上无可伦比的泱泱大国和文明古国，在神州大陆自有人类以来，至今还保留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遗迹；自有文字以来，更粲然留存着四千余年的文、史。民族的大融合，逐渐成为至今十亿人口的中华民族，更使中国的文、史丰富多采。

我们中华民族，既善于辨识自己的优良传统，又敢于汲取其它民族文化的精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都说明离开中国文、史，将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再如我们现在面向四化，还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何等伟大的奋斗目标！而在宋朝，理学家关中张横渠就指出：学者要“为万世开太平”，这看的是多么长远。致远必须自迩，自迩就要立足中国，立足现在。立足必须以认识为基础，因此不仅要了解中国的今天，还要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就是我们文史工作的重要性。

要了解、要认识我们的今天，我们今天努力的首要方面是：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发展生产力，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在一定时期达到既富且强。不富就不能强，不强就会有被强敌虎视眈眈、企图吞噬的威胁。因此，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致富，富国富民。这既合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又合于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远在两千多年前，孔子的政治思想中的“三部曲”，就是人多、发财、教育（见《论语》“子适卫，冉有仆”章）。这更增加我们对文、史的重视。

在当前，我国热火朝天的“四化”建设中，敞开大门有选择地向西方学习，欧风美雨中，有时会挟着些邪风酸雨以俱来。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号召全国人民要有理思、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就包含着继承、发扬中国文、史最重要的内容。

《文史杂志》是适合老、中、青文史工作者，文史研究、教学人员，文史爱好者阅读而以知识性为主的多面性刊物，通过多面性，愈能反映出文、史内容的广泛性。不仅要能反映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学术和历史，而且要对文、史在世界各地所产生的影响，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史的研究情况和成果，也要作宣传介绍，由此以观中国文、史在世界上的地位。为此，《文史杂志》应须新开拓，又数典不忘祖。

前几天，我偶然想起《大学》汤之盘铭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句，很有感触，曾吟过两句诗：“汤盘明镜思公用，为厚今人爱古人”，即以此作为本篇结束语吧！

孙中山与四川辛亥革命

· 隗瀛涛 ·

今年8月12日，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日。全国人民在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前进道路上，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是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在近代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是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封建帝制，使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他为了中国的独立、富强、进步和统一而终身奋斗，至死不息的精神，是中国人民世代继承的精神财富。在此时刻，四川人民也不会忘记孙中山先生对四川辛亥革命所产生过的巨大政治影响和指导作用。

在辛亥革命时期，四川许多热血青年、爱国志士是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影响、感召下，走上革命征途的。1894年，孙中山组织爱国华侨志士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在兴中会会员中，就有名叫张硕臣的四川人，学生，1900年加入兴中会。这是目前见于史籍记载的，最早追随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四川人。到了二十世纪初年，已经有不少青年仰慕这位著名的革命家，他们纷纷东渡日本，以会见孙中山为荣幸，以追随孙中山的道路为归宿。如：井研县爱国青年曾贯、抱着实业救国的宏愿的税钟麟、巴县志士张树三、川籍同盟会员童宪章、叙永县青年杨维、荣县丁厚扶等。熊克武更是详细回忆了他和其他四川青年在孙中山启导之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1903年冬，熊克武赴日留学，在东京接触到更多的爱国志士，读到一些进步书报，开始倾向革命，但是怎么进行革命，依旧茫然。他说：“我早就听说过孙逸仙的名字，知道他是革命家很希望有机会见到他。”1905年7月，当熊克武但懋辛等四川留日学生听到孙中山到达东京的消息之后，激动万分，奔走相告，终于如愿以偿的会见到孙中山。熊克武生动地记下了他们会见孙中山先生的情

形：“孙先生问及我们来日本想学什么，我们说：‘打算投考陆军学校，毕业后回国带兵，革命救国。’孙先生即指示我们：青年人立志革命救国，很好，很好！不过列强急谋瓜分中国，清廷腐败无能，亡国灭种祸在旦夕，爱国志士应积极准备革命，以救危亡；要是都等到学成归国再来革命，时间恐怕来不及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2页）在孙中山的启发下，熊克武等人立即加入同盟会，投身于革命事业。在孙中山的启发感召下，许多四川留日学生都加入了同盟会组织。在同盟会总部任职的川籍革命党人有评议部议员董修武、熊克武、但懋辛、吴永珊（玉章）、吴鼎昌等人。执行部书记有李肇甫。黄复生任四川分会长。据《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记（1905、1906年）各省同盟会员共960人，四川留日学生参加的就有127人，其中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者就有9人。人数之多少仅次于广东、湖南。

同盟会集合了全国各省的优秀革命志士，承担了作为全国革命中心的历史使命。而四川籍的革命党人亦成为同盟会中一支引人注目的生力军。

二

四川的同盟会组织也是在孙中山先生直接指导和关怀下发展起来的。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后。川籍同盟会员童宪章、陈崇功二人“奉中山先生命”，于1906年，携带同盟会的规章、公约、誓词和计划方略等回重庆“征集革命党员”。重庆的革命小团体“公强会”（1903年成立）“推杨庶堪与朱之洪首应盟约”于是“乃设同盟会重庆支部”，同年孙中山又派熊克武、黄复生等人回川“揽结同志”，在成都发展盟员，建立支部，并在各州县发展组织。1906年——1911年间，四川多数地区都有了同盟会的活动。成渝两地的同盟会机关不仅是四川革命党人行动的中

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南革命党人的活动。四川同盟会在教育界、工商界、军界以及会党群众中都发展了不少党人,成为四川社会中一个很有影响的政治集团。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在这个时候传播于四川,成为四川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还在1903年,杨庶堪等人在重庆创办《广益丛报》,传播西方的民主主义及文化思想,以树风声、作民气。同盟会成立之后,该报公开宣传同盟会的主张,介绍革命党人的斗争事迹。1906年10月《广益丛报》总118、119号转载了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革政之前途》一文(原刊在《民报》第4期)详细介绍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对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亦作了扼要介绍。这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第一次在四川地区公诸报端。

四川同盟会员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同盟会的革命主张。1906年大竹县同盟会组织“大竹书报社”,陈列《民报》等革命刊物,供人浏览。川西同盟会员在会党首领中传阅《民报》、《复报》、《黄帝魂》等革命书刊,使他们“了解中山先生在海外工作”。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深入于革命志士心中,成为他们行动的指南。向楚回忆说:他目睹清廷政治腐败,丧权辱国,感到中国应当实行政治改革,因而赞成孙中山提出的政治纲领“自思非入盟不足以言革命”,而且“相信主盟人孙中山先生”,于是勇敢向前,加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75页。)1908年11月2日,江油革命志士凌阍,以“大汉革命排满光复军总司令官”的名义,发布反清檄文,言词慷慨地陈述了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发动广州、镇南关、河口等武装起义的革命业绩。(檄文原件照片,四川省博物馆藏。)这些史实,充分证明:孙中山不仅在组织上直接领导着四川的革命运动,而且在政治思想上对四川革命的兴起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

三

同盟会成立之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明确举起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旗帜,把开展武装斗争作为同盟会的基本任务。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以杀身求共和,流血殉自由的献身精神,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四川革命党人举行的武装起义次数之频繁,斗争之激烈在全国也是十分显著的。而四川武装斗争的兴起发展也直接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指导。

早在1897—1898年时,孙中山在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笔谈讨论武装起义的组织 and 策略时,宫崎寅藏向孙中山介绍过四川的情况,认为四川

不仅有“才略兼备任大事者”,而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建议孙中山“以四川为负隅之地,在张羽翼于湘、楚、汴梁之郊”(《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83页。)。尽管当时孙中山考虑沿海革命势力较众,且便于从海外运济军火,把策划武装起义地区侧重于两广、云南,但他毕竟从宫崎寅藏那里对四川的情况有所了解。此后,孙中山对在四川发动武装起义也予以足够的重视。同盟会总部根据孙中山的意见派熊克武等人回川,任务是:“先把散处各地的同志联络好,并设立机关,吸收党员,扩充力量,作为起义的领导和骨干。然后再组织学生,联合会党,运动军队,发动起义。”(《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5页。)1906年,熊克武在成都召集部分同盟会员会议于草堂寺,决定遵照同盟会总部的指示,分工负责,积极准备在四川举行武装起义。于是继1906年同盟会员李实在江油起义之后,同盟会先后在四川策划和举行了1907年江安、泸州、成都、叙府起义,1909年广安起义,1910年嘉定起义和1911年黔江起义。

孙中山组织武装斗争是从联络会党入手的。四川会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自发的反清斗争亦持久而激烈。孙中山十分重视四川会党在武装起义中的作用,希望把会党自发的斗争引入自觉的民主革命的轨道。川南著名会党首领,泸州人余英就是在孙中山的具体指引下成为一个民主革命战士的。余英最初读到《革命军》、《警世钟》后,萌发了反清意识,并“日持两书在市井讲演,听者如堵,皆大感动。”1906年,川省同盟会员黄复生、杨兆蓉等邀余英东游日本,受到孙中山亲自接见,晓以革命道理,使余英“对革命主义极至倾折”。(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余英传》。)孙中山对余英“大为器重,付以打通川滇黔会党之责,状委为西南大都督,派同并研熊克武、自贡谢奉琦回川,共策进行”。此后,余英不负孙中山之重望,奔走四川各地,组织和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赴汤蹈火,直到1910年英勇牺牲。

江安、泸州、成都起义相继失败后,四川同盟会派杨兆蓉经上海去新加坡向孙中山报告情况。孙中山“属告川中同志,努力勿懈”。杨兆蓉回忆了他这次会见孙中山的情形。他由胡汉民、汪精卫陪同在郊外一座别墅里见到中山先生,孙中山详细询问了四川革命情形,杨兆蓉一一回答之后。孙中山勉励说:“很好,革命活动海外国内都是一样。南洋情形汉民,精卫慢慢告诉你,活动时方有把握”。(杨兆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新加坡同盟会的《中兴日报》还专门发表《成都革命党人狱记》

一文，报导了四川起义的真相。孙中山对四川革命党人斗争的悉心指导和亲切关怀，增强了四川革命党人胜利的信心。

同盟会在四川的各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却扩大了同盟会在四川的政治影响，鼓舞了四川广大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热情，为大规模的反清武装起义的发生播下了火种。辛亥秋同盟会领导的保路同志军大起义正是这些失败的武装斗争的延续和扩大。

1911年夏秋之际，反对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和清王朝卖国卖路的四川保路运动，以磅礴的气势、浩大的规模席卷全川。四川同盟会员因势利导，“借保路之名，鼓动人民以行革命之实”，决定“组织民军，共同革命”。（曹叔实：《四川保路同志会与四川保路同志军之真象》。）9月7日“成都血案”之后，群众性的爱国运动，迅速发展为同盟会领导的反清武装大起义。各路同志军揭竿而起，包围成都占据新津，扼守大相岭，进军自贡盐场，武装斗争如急风暴雨扫荡着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同志军起义标志着全国革命形势的成熟，鼓舞着全国的革命党人。黄兴等人一扫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的气馁情绪，“已灰之心复燃”，立即于9月30日致信在加拿大的冯自由，请他转告在美洲的孙中山，“请设法筹集大款，以谋响应”，并说他不日即将赴长江上游参加鄂省起义。（《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当时正在美国北部各埠华侨中筹集款项，演说革命的孙中山，闻悉四川同志军起义消息后，曾在9月14日复函萧汉卫中指出：“近日祖国风云日急，四川已动，若能得手，则两广、云贵、三江、闽浙不得不急起而为之援应，到时弟或不待筹款之成而立当回国也。”（《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39页。）9月25日，孙中山又在另一封信中写道：“近日四川省起大风潮，为民众与政府之间发生铁路争端所引起。我党在华南的总部诸君大为激动，因为谣传四川军队已卷入纷争。如所传属实，则我党人拟策动云南军队首先响应，而广东军队亦将继起。但我不相信此一传闻，因我们从未打算让四川军队在国民运动中起首倡作用，这方面它尚毫无准备。据官方报道，四川新军拒不服从总督的作战命令，但亦未加入民众一边，即持中立态度，我认为此与事实相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0页。）孙中山远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仍然十分关注着全国尤其是四川革命形势的发展。从孙中山信中所言可知，对于四川新军未能在辛亥革命时期发挥更大作用，除了四川新军本身不团结，军队中同盟会员如同散沙等原因之外，与同盟会总部的布置亦有关。据程潜回忆：他离川之时，曾告诉四川新军将领“以不介入这次风潮（按：指保路风潮）为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

76页。）应该指出，同盟会在四川没有充分发挥新军的作用虽然有客观原因，但终究仍是一失策。

四川同志军起义举起了孙中山提出的政治纲领，“各军皆树旗四面，文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将保路之面具揭去，而树同盟革命军之旗帜。”（曹叔实：《四川保路同志会与四川保路同志军之真象》。）宣告自己的斗争已迥然不同于旧式农民自发斗争，而是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了。1911年11月22日，重庆同盟会员在渝举义，建立蜀军政府，发布的政纲、宣言等文件按照同盟会总部的纲领、宣言写成。其中《对内宣言》，接受了孙中山民族主义中革命是推翻满洲贵族专制统治而非消灭所有满族的思想，对同盟会总部六年前制定的宣言中不恰当的提法予以修改。1912年1月6日，蜀军政府电贺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称颂他“为提倡民族主义第一伟人。”

（《重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第93页）

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的壮举，导发了举世瞩目的武昌起义，一举推翻了二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其历史功绩永不可磨灭，孙中山先生对四川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予了公正的评价：“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161页。）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孙中山先生及其同盟会的政治影响和具体指导，四川保路运动也不可能迅速发展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洪峰。

四

在辛亥革命急风骤雨似的阶级斗争中，四川涌现出了一批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英雄人物和仁人志士，他们留下的爱国革命的优良传统，开创了近代四川革命人材辈出、对全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时代。四川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三大将军——“革命军中马前卒”巴县邹容，“浩气长存”的黄花岗著名烈士内江喻培伦，“歼除大敌，以收统一速效”，勇炸宗社党头目的金堂彭家珍，就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代英杰。我们不能忘记，“三大将军”正是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时，亲自下令追赠的。三大将军是四川人民的骄傲，是人民革命的先驱。四川人民将永志不忘三大将军的光荣业绩，也永志不忘孙中山先生对四川革命斗争和一代英杰所作出的崇高评价，更永志不忘孙中山先生对四川辛亥革命的巨大政治影响和指导作用。

今天当我们缅怀孙中山先生革命事迹之时，耳边响起了孙中山先生“生在中国实为幸福”的名言和“振兴中华”的号召，不禁热血上涌心潮澎湃。孙中山当年渴望祖国强盛和统一的理想，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实现。

老教育家

陶行知

· 龚思雪 ·

陶行知是我国杰出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有为人民教育事业而献身的精神。他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经过不断的学习、探索和革命实践，认清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终于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成为“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陶行知出生于农村，穷苦的生活锻炼了他，他勤奋学习，经常接触人民。后来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南京金陵大学学习，毕业后又借债去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

1917年，他回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长，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他致力于我国教育改革事业，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论文，提出了许多革新教育的主张。1919年，陶行知组织南京教育界联合会，被推选为会长，领导各校师生开展进步活动。

“五四”运动的消息一传到南京，他就召集各校师生在小营演武厅开会，痛斥卖国贼，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

陶行知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人物，是知识分子中较早认识到教育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满腔热情地到农村去做乡村教师的人。1926年后，提出“教育必须下乡，知识必须给予农民”的口号，要求“乡村教师必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他反对搞封建的传统教育，也反对照搬外国的一套资产阶级教

育。他积极推行乡村教育运动，影响很大。1927年3月，陶行知放弃大学教授地位，辞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校长不就，到南京郊外劳山脚下创办了著名的晓庄师范。这所新型的学校实施教育与农业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倡“在劳力上劳心”，强调“教、学、做合一”。陶行知穿着布衣草鞋，带着学生在荒山旷野搭起帐篷做教室，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他教育学生“以老农为师”，“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培养了一批为中国大众教育开路的先锋。周恩来同志曾经在一个报告中谈到：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

晓庄师范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师生，积极支持1930年“四五”南京反帝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开进长江侵略我国的罪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深重，他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1932年10月，他在上海和宝山间的乡村中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开展普及教育运动。山海工学团从成立之日起到全国解放，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了一批人才，贡献了不少力量。他反对知识私有，提倡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实行“小先生制”，动员全国小学生做小先生。这种方法很快就推广到二十一个省和四个特别市，形成了一支普及教育的大军。突破了数十年来中国义务教育的记录。

1934年，陶行知参加了党所领导的“苏联之友”这个组织的秘密活动。当时，白色恐怖非常厉害。作为在社会上已是著名人物的陶行知，甘冒风险参加这样的秘密集会，可见他对革命的热情和气魄。

陶行知从他的多年实践中，深刻了解共产党的主张正确，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大公无私，在为人民和民族的利益奋斗时坚强不屈。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加紧侵略我国以及蒋介石腐败无能，和“不抵抗主义”。他坚决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36年，他和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发

起组织救国会，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这时，他在政治思想上产生了一个飞跃，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成为党的亲密战友。

陶行知在极端复杂困难的条件下，能审时度势，他善于同一切爱国者和进步人士合作。陶行知曾冲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重障碍，于1936年7月赴伦敦参加世界教育会议。中国共产党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委托他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开展广泛的国民外交活动。他在海外二年多，周游亚、非、欧、美二十六个国家和两个地区，参加了很多国际人民团体的会议，开展了广泛的访问、讲演、募捐等活动，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主张，为动员广大侨胞和世界人民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影响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罗曼·罗兰、甘地等世界名流援救在狱中的中国救国会的“七君子”。他发起组织的中华经济研究社，调查出日本从美国输入的军需材料，竟占日本侵华全部军需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五。这个调查报告被列入美国国会公报，成为美国对日禁运的中心依据。他还带领我国的留美学生在纽约码头上对码头工人讲演宣传，激起他们举行大规模罢工，以拒绝搬运助日军火。他还用在美国和加拿大讲演所得的钱购买医药器材运回国内，通过宋庆龄同志，支持白求恩医疗队。

1936年10月，陶行知在伦敦曾瞻仰马克思墓，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注：这是马克思的墓号），小坟葬伟大”。1938年，他同吴玉章同志一道又再次瞻仰，表明了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敬仰。

1938年10月，陶行知到武汉参加国民参政会，在会上他提出推行普及抗战建国教育方案。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这是一所在党领导下为中国革命培养和输送人才的学校。

陶行知提出育才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要引导学生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觉人的小先生，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和反对侵略的小战士。

早在创办育才学校时期，陶行知就受到

地下党的支持和协助，以后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为了适应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形势和秘密工作的需要，在校内建立了两个行的地下党支部。一个党支部由担任学校各部（室）负责人的党员组成，任务是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上起核心领导作用，支持、配合陶行知校长把育才办成一所新型的革命学校和抗日民主运动的坚强据点。王洞若、魏东明先后任书记，属南方局领导同志凯丰直接联系；另一个党支部由校内其他党员组成，任务是团结全校师生职工，保证教学和其他各项任务的完成，由林琼、程森先后任书记，属北碚中心县委书记李亚群联系。周恩来同志曾指示：“支部在那里首先要搞好团结工作；首先要帮助陶先生把育才学校办好”。

1940年10月的一天夜里，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一道乘车到北碚陶行知的家里，同他推心谈国事，促膝论教育。当晚，就住在陶行知的家里。第二天，还去古圣寺育才学校参观，给全校师生讲了话，为同学们题了词：“一代胜似一代”。后来还捐款四百元，为同学们购买运动器具，勉励大家把身体锻炼好，学习得更好。党的关怀，给陶行知和育才学校师生增加了战胜困难的无穷力量。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加紧迫害进步势力，育才学校处境险恶。根据党的决定，不少党员撤离了育才学校，或转移到其他工作岗位，或到解放区延安等地。留下坚持的和新来的党员组成一个地下党支部，由廖意林任书记，属南方局邢西萍（徐冰）直接联系。1946年上半年，南方局迁离重庆后，改属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联系。1947年2月28日，中共四川省委被国民党强制封禁后，党支部和上级党委的联系一度中断，不久，中共重庆市委同他们接上了关系，先后属江竹筠（江姐）、李维嘉联系。育才学校地下党支部在长达七年的时间中，紧密团结和依靠师生职工，兢兢业业地进行各项工作与斗争，成为全校坚强的领导核心。

育才学校许多教师都是专家学者，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如王洞若、方与严、帅昌

书、戴白韬、马倡贤、孙铭勋、苏永扬、艾青、贺绿汀、李凌、戴爱莲、陈烟桥、魏东明等。曾在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讲过课的有：郭沫若、吴玉章、翦伯赞（历史、政治）、秦邦宪（哲学）、邓发（中国工人运动史）、柳湜（教育学）、马寅初、张友渔（经济学）、熊复、于刚（新闻学）、李公朴（政治）、史良（法学）、邓初民（历史），讲文学课的有曹清华、何其芳、沙汀、艾芜、徐迟、骆宾基等著名作家。共产党员们对陶行知是很有影响的。有一次，陶行知对戴白韬说：我为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奋斗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还是无党无派，如果我要入党的话，可以毫不思索地加入共产党，并且毫无保留地听从党的一切决议。

陶行知和南方局的同志经常往来。周恩来、邓颖超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同志对陶行知和育才学校师生也十分关怀。在白色恐怖严重、情况紧急时，南方局曾通过陶行知向育才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廖意林传达过重要指示。解放区的重要学习资料也是通过陶行知交给育才学校地下党员的，周恩来同志把陶行知视为亲密战友，他们之间有肝胆相照、安危与共的关系。陶行知实际上是在党的影响和领导下工作的，每当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民主运动内部发生矛盾，育才学校遇到困难时，陶行知就到周恩来同志那里去请教。他曾对夫人吴树琴说：去时腹中空，回时力无穷。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陶行知为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解放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积极参加创建中国民主同盟的工作，是民盟的领导人之一。1944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他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接受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和影响，在领导民盟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陶行知教育思想和现实斗争的激励下，育才学校的同学们逐步成长起来。从抗

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一批又一批的同学被输送到延安、中原和苏北抗日根据地，有些人还到了浙东和川东北游击区去参加革命工作。

陶行知对地下党的同志、进步朋友和劳苦大众的困难都十分关心，积极帮助。如对历史学家翦伯赞，当其贫病交加时就及时予以帮助；他的学生、共产党员刘季平、徐明清（王观澜的爱人）等被捕，他就尽力去营救。他还安置过从海外回来一时找不到工作的同志。陶行知和党的亲密关系可以说是水乳交融的。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以更大的革命热忱，以坚强的民主战士的姿态，奋不顾身地投入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1946年4月初，他和夫人吴树琴到南京梅园新村看望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向他们分析了当时国内形势的发展，陶行知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对育才学校迁沪的打算。此后，他们随即去上海。上海地下党派方明同志帮助他进行育才学校迁沪等工作。在上海，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捣乱、恐吓，发表讲演一百多次。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黑名单上的第三名是陶行知。当郭沫若、翦伯赞等要他提防“无声手枪”时，他坚定地说：我等着第三枪！他在给重庆育才学校师生的信中说：如果消息属实，我会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号召一万个来顶补！他无所畏惧地坚持工作，着手整理诗稿。1946年7月26日，终因劳累过度，不幸患脑溢血去世。

陶行知去世后，周恩来同志立即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弥补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

记顾颉刚先生主编的

《文史杂志》

·方诗铭·

《文史杂志》是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主编的文史刊物。出版的地方主要是四川重庆，最后则是在上海。杂志是在战火纷飞的1941年创刊的，在极端低劣的物质条件下，由半月刊而月刊，再由月刊而以合期形式出现的双月刊。尽管如此，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为止，《文史杂志》仍旧出版了五卷，成为当时寿命最长的刊物之一。这是和顾颉刚先生的努力分不开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后方，主要是西南，对文史工作者和文史爱好者来说，这个杂志不是陌生的，它拥有大量的读者，为他们所喜爱。为什么？这得从顾颉刚先生，以及他创办这个杂志的动机说起。《文史杂志》创办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年代，据颉刚先生后来的回忆说：“《文史杂志》是民国三十年在重庆创刊的。那时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敌机除了雾季之外，差不多天天飞到重庆，都市里的人民日夜在进防空洞。一座好好的重庆城，炸得几乎没有一间完整的屋子，我们在这个时候来办这个杂志并不是有什么闲情逸致，我们只是认为：战事不知何日終了，我们不知再可活几天，如果我们不把这一星星的火焰传衍下去，说不定我们的后人竟会因此而度着一个长期的黑暗生涯。历史的传统是不能一天中断的，如果中断了就会前后衔接不起来。我们都是服务于文化界的人，自己的生命总有中止的一天，不值得太留恋，但这文化的蜡炬在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中总得点着，好让子遗的人们或其子孙来接受这个传统。这传统是什么，便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立国根本。”（《文史杂志》六卷一期《复刊词》）这里说得很明白，颉刚先生创办《文史杂志》的动机是，以我们伟大光荣的历史，激励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鼓舞人们争

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心。这是爱国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一贯的思想。

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当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书的时候，鉴于民族危机的深重，他就走出书斋，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当时，颉刚先生一方面创办“三户书社”，取义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古语，以隐喻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决心。后来才被迫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书社编写出版了大量利用民族形式（如京戏、鼓词等）宣传抗日救亡的普及读物。另一方面，颉刚先生又创立了“禹贡学会”，一个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和边疆史地的学术机构，并出版《禹贡半月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建立禹贡学会？它的工作计划中曾经写道：“本会同人感念国事日非，惧民族衰亡之无日，深知抱‘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实未可以应目前之急，亦非学人以学术救国所应出之一途，爰纠集同志从事于吾国地理之研究，窃愿借以激起海内外同胞爱国之热诚，使于吾国疆域之演变有所认识，而坚持其爱护国土之意向。”（《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见《禹贡》三周年纪念号）这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下，以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爱国学者们的救亡呼声。《禹贡》的“东北研究专号”，更直接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我国东北四省的罪行，从冯家昇先生的《原始时代之东北》这篇文章开始，以坚强有力的历史资料，论证了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正因为顾颉刚先生长期从事救亡活动，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他十分注意。“七七”前夕，由于敌人追捕，他从北京匆匆南下，回到故乡苏州。抗日战争开始，颉刚先生又远赴西北考察，再从西北到昆明，在云南大学教书。后来又从昆明赴四川成都，担任齐鲁

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在这民族的苦难时代，他终于毅然放弃了手创的国学研究所，离开成都，到重庆创办《文史杂志》。

从抗日战争前夕的《禹贡半月刊》到抗日战争中的《文史杂志》，顾颉刚先生所创办的这两个刊物，是一脉相承的，动机和目的都是为了宣传爱国主义，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

“文史”一词是古已有之，《汉书》的《司马迁传》和《东方朔传》都出现过，尽管那时的意思是指文书记事，但后来人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都是指文学和史学了。

《文史杂志》的取义和内容即是如此。我想，顾颉刚先生在采用“文史”这个词作为杂志名称的时候，除上面所说的之外，是不是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呢？中国史学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文”与“史”的结合。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特别称道两部史学著作，一部是《左传》，一部是王邵的《齐志》，认为都写得十分生动。《左传》描写春秋时代的战争，委曲详尽，具有高度的文采。《齐志》虽然失传，但从唐代李百药《北齐书》所撷取的部分看来，王邵描绘细致，语言生动，对话中还保留了不少当时的口语，在他的笔下，一些历史人物真是栩栩如生。刘知几所强调的，就是“文”

“史”的结合。顾颉刚先生是当代杰出的史学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他的史学著作（包括某些考证性的著作），真是文采斐然，使读者忘记了他是在读史学作品。《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曾经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被看作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传记文学的代表作品。他在燕京大学“秦汉史”的讲稿——《汉代学术史略》，后来改名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既是一部有独创性的严肃的史学著作，应该说，这又是一部生动活泼文学作品；直到今天，尽管差不多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仍旧为人们（包括青年）所喜爱，拥有大量读者。从上举两例可以看出，顾颉刚先生是完全继承了中国史学的这个优良传统的。在这民族苦难的时代，如前所说，顾颉刚先生是反对“闲情逸致”，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他提倡史学著作要写得生动，有文采，目的是为

了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因此，他为《文史杂志》提出的三个“使命”，第一个使命就就“我们要深入，可是我们没有忘记要浅出”。顾颉刚先生专心致志于史学研究上的提高，也特别注意历史知识的普及，“深入浅出”，这是他常常挂在口边的一句话。他相信，《文史杂志》的一些文章，在激励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上，是比单纯从事提高工作更为有意义的。对历史知识的普及，顾颉刚先生不但提倡，自己也认真实践，《文史杂志》上就发表过他的《商王国的始末》、《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等几篇通俗生动的古代史文章。同时，他还发起并主编一套普及性的《中国名人传》，自己所写的《晋文公》，当时即被誉为：“此为极生动之通俗历史，不独对民众，即一般智识阶级之非专攻历史者，读之亦觉盎然有味”。历史学的“深入浅出”，应该说，这包括了两种意义，既是提高与普及的结合，又是“文”“史”的结合，我想，这是符合顾颉刚先生的本意的。“我们要深入，可是我们没有忘记要浅出”，这所以被列为《文史杂志》的第一个“使命”，也是有其深远意义的。

从1941年创刊到1943年，《文史杂志》是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发行的；1944年到1945年改由重庆中华书局发行，直到抗战胜利为止。五年中，《文史杂志》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章，出过许多专号，这无负于顾颉刚先生为《文史杂志》所规定的使命，也无负于顾颉刚先生宣扬爱国主义思想的心愿，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尽了它的微薄之力的。抗战胜利之后，顾颉刚先生回到故乡苏州，仍念念不忘《文史杂志》的继续出版。其间曾在上海复刊过两次，第一次是交由中国出版公司发行的，仅公开出版六卷一期，第二、三两期已有清样，却没有发行。这是第一次复刊。第二次复刊是交由文通书局发行的，仍从六卷一期开始，但也仅公开出版了三期。《文史杂志》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因为《文史杂志》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发行，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全份，据我所知，仅顾颉刚先生自己所收藏的一部完整无缺。如果能将这个刊物重新影印出版，我想，这是不无意义的。

(忆)(蒙)(文)(通)(与)(汤)(用)(彤)

—— 钱 穆 ——

编者按：此稿由四川省图书馆蒙绍鲁同志提供。绍鲁同志是根据她所得钱穆先生《师友杂忆》书稿，将其中有关钱穆先生与她父亲蒙文通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的认识、交游、学术探讨和友谊摘编而成。钱穆先生现仍居台湾，但从《师友杂忆》字里行间，无时不流露出对昔日的怀念。

俯仰湖山 畅谈古今

余前在无锡三师时（按：钱穆先生是1923年秋入无锡第三师范学校执教，1927年秋离开。）每周必有周会。诸生聚大礼堂，由学校聘校内外一人作演讲，讲辞由校刊刊载。有一次由余主讲，讲题今已忘。大意为先秦诸家论礼与法。蒋锡昌时在四川重庆某校任教，得三师校刊，将余此篇讲辞转示其同事蒙文通（按：时蒙文通先生先后在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和重庆联中任教）。文通川人，其师廖平（季平），乃当时蜀中大师。康有为闻其绪论，乃主今文经学。而季平则屡自变其说。文通见余讲辞，乃谓颇与其师最近持义可相通。遂手写一长札，工楷，盈万字，邮寄余。及余在苏中（按：钱穆先生1927年秋转入苏州中学任教），文通已至南京（按：时为1929年），在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一日，来苏州访余，两人同游灵岩山，直至太湖滨之邓尉。时值冬季，余与文通各乘一轿，行近邓尉时，田野村落，群梅四散，望皆是。及登山，俯仰湖天，畅谈今古。在途数日，痛快难言。而文通又手携余先秦诸子系年稿，轿中得暇，一人独自披览。语余曰，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及返苏州城，文通读系年稿未毕，但急欲行，遂携余稿返南京。文通有友专治墨学，见余稿，手抄其中有关墨家

诸篇，特以刊载于南京某杂志，今亦忘其名。是为余之先秦诸子系年稿，最先惟一发表之一部分。

曙光既露 谈兴未尽

与余同年来北大者（按：钱穆先生是1931年夏天接北京大学聘），尚有哲学系汤用彤（锡予）。本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按：时汤用彤、蒙文通先生同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北大以庚款补助特聘教授之名义邀来。余是年携眷去北平，潘佑荪割其寓邸之别院居之，距北大甚远。一日，锡予来访。其翌日，锡予老母又来访。谓，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常嫌其孤寂。昨闻其特来此访钱先生，倘钱先生肯与交游，解其孤寂，则实吾一家人所欣幸。自是余与锡予遂时相往返。

一年后，余家自西城潘宅迁二道桥，凡三院四进，极宽极静。年假以榆关风声紧，挈眷奉先慈返苏州，锡予老母亦随行返南京。明年春，余单身先返北平，适锡予老友熊十力自杭州来，锡予先商于余，即割二道桥第三进居之。此本为先慈居住之所，平屋三间。其第二进仅一书室，为余读书写作之所。此两进相隔最近，院最小，可以隔院相语。十力既来，而余眷久不来。锡予为余一人饮食不便，又劝余迁居其南池子之寓所，割其前院一书斋居余。而又为十力别邀一北大学生来居二道桥之第一进。

是年暑假（按：指1933年），蒙文通又自开封河南大学来北大，与余同任教于历史系，锡予在南京中大时，曾赴欧阳竟无之支那内学院听佛学，十力、文通皆内学院同时听讲之友。文通之来，亦系锡予所推荐。文通初下火车，即来汤宅，在余室，三人畅谈，竟夕未寐。曙光既露，而谈兴犹未尽。三人遂又乘晓赴中央公园进晨餐，又别换一处饮茶续谈。及正午，乃再换一处进午餐而归，始各就寝。凡历一通霄又整一上午，至

少当二十小时。不忆所谈系何，此亦生平惟一畅谈也。

自后锡予、十力、文通及余四人，乃时时相聚。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文通不谓然，每见必加驳难。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惟余时为十力、交通缓冲。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作缓冲。

白杨萧萧 难得之夜

又一次，则予与锡予、十力、文通四人同宿西郊清华大学一农场中。此处以多白杨名，全园数百株。余等四人夜坐其大厅上，厅内无灯光，厅外即白杨、叶声萧萧，凄凉动人。决非日间来游可尝此情味。余等坐至深夜始散，竟不忆此夕何语。实则一涉交谈，即破此夜之情味矣。至今追忆，诚不失为生平难得之夜。

除十力锡予文通与余四人常相聚外，又有林宰平、梁漱溟两人，时亦加入。惟两人皆居前门外，而又东西远隔。漱溟又不常在北平，故或加宰平，或加漱溟，仅得五人相聚。宰平与漱溟则不易相值。

文通离职 继任难选

某日，适之来访余。余在北平七八年中，适之来访仅此一次。适之门庭若市，而向不答访，盖不独于余为然。适之来，已在午前十一时许，坐余书斋中，直至午后一时始去，余亦未留其午膳。适之来，乃为蒙文通事。适之告余，秋后文通将不续聘。余答，君乃北大文学院院长，此事与历史系主任商之即得，余绝无权过问。且文通来北大，乃由锡予推荐。若欲转告文通，宜以告之锡予为是。而适之语终不已，余曰，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在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两人终不欢而散。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

文通既不续聘。史系主任遂邀余任魏晋南北朝史，余拒不允。余言聘约规定余只任

上古两汉，不愿再有增添。其隋唐史一门，则聘陈寅恪兼任，上堂仅盈月，寅恪即辞去不再来。谓其体弱，其夫人言，若不去北大兼职，即不再过问其三餐。于是此课遂临时请多人分授。学生有发问者，谓此课既由多人分授，何以独不有钱某来上课。史系主任始来请余。余遂亦上堂一二次。文通自离北大，即转至天津一女师任教。其家仍留北平，与锡予及余诸人之来往则一如旧日无变。

因锡予获交于寅恪、吴宓

余又因锡予获交于陈寅恪。锡予、寅恪乃出国留学前清华同学。寅恪进城来锡予家，常在余所居前院书斋中聚谈。寅恪在清华，其寓所门上下午常悬休息敬谢来客一牌，相值颇不易。余本穿长袍，寅恪亦常穿长袍。冬季加披一棉袍或皮袍，或一马褂，或一长背心，不穿西式外套，余亦效之。

余亦因锡予识吴宓（雨生）。彼两人乃前中大同事。余在清华兼课，课后或至雨生所居水木清华之所。一院沿湖，极宽适幽静。雨生一人居之。余至，则临窗品茗，窗外湖水，忘其在学校中。钱稻孙与余同时有课，亦常来，三人聚谈，更易忘时。雨生本为天津大公报主持一文学副刊，闻因大公报约胡适之、傅孟真诸人撰星期论文，此副刊遂被取消。雨生办此副刊时，特识拔清华两学生，一四川贺麟，一广东张荫麟，一时有二麟之称。贺麟（自昭），自欧留学先归，与锡予在北大哲学系同事，与余往还甚稔。荫麟自美留学归较晚，在清华历史系任教。余赴清华上课，荫麟或先相约，或临时在清华大门前相候，邀赴其南院住所晚膳。煮鸡一只，欢谈至清华最后一班校车。荫麟亲送余至车上而别。

毕生好学 劬劳不息

但锡予亦决非一佛门信徒，处身世外者。锡予有老母、有长兄，其妻室、其子女余皆熟稔。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绝少有少许留学生西方气味。而其任职处事，交游应世，又何尝有少许佛门信徒之形态。然

黄清华

柳亚子与二十二个社会团体

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里，曾多次发起组织了诗社、学社、酒社和其他社会团体，又参与过一些党派的组织 and 领导工作。这些社会团体，诸如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以及后来柳亚子先生发起的“民革”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都发生过深远的影响。柳亚子的这些社会活动，形式上可谓千姿百态，而内容大都与民族革命、民主斗争密切相关，是他生命史上的重要环节。

1902年，柳亚子（以下简称“柳”）十六岁，就读于家乡黎里（江苏省吴江县）。其间受梁启超思想影响甚深。是年，曾有意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惜未遂。这是他热心于社会活动之始。

1903年，在家乡黎里，由同邑陈去病和金松岑介绍，参加中国教育会，并加入金松岑在同里镇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该会1902年4月成立于上海，由黄中央和蔡子民（元培）主持。

同年夏，柳又与同邑蔡治民、陶亚魂等往上海，加入爱国学社。时章太炎为该学社国文教师。始与黄中央、蔡子民、章太炎、邹容等著名革命家相识，进一步确立了反满革命思想，反对保皇主张。

1904年秋，在黎里参加邓实、黄节于上

海组织的国粹学社和国学保存会。

1905年秋，柳十九岁，在同里镇发起组织了学生自治会，主办《自治报》（后改名《复报》，取光复中华之意）。柳在该报上撰文甚多。

1906年夏秋之际，在上海参加中国同盟会，并谒见了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先生。旋又由蔡子民介绍，加入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光复会1904年冬成立于上海，以反对满族封建贵族专制，建立共和国为宗旨。蔡子民任会长。对于接连参加两大革命团体一事，他在《南社纪略》中，曾风趣地称自己是“双料的革命党”。继之，将先前所办同里自治学会更名为青年会，柳自称该会是“同盟会的预备军”，并自任书记兼会计。

1909年夏，与同邑沈眉若等创建分湖文社于家乡黎里。

同年11月13日，酝酿经年，他与陈去病、高天梅发起的，有显著历史地位的反清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成立于苏州虎丘张东阳祠。他被推举为书记员。其后，南社集中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中许多知名诗人，以文学鼓吹革命，鼓吹推翻满清政府。

1923年5月，柳与南社旧友叶楚傖、邵力子、陈望道、曹聚仁等八人，发起成立“新南社”，于本年10月14日正式成立。柳被公举为社长。该社宗旨是“鼓吹三民主

义，锡予之为学似一事，其为人则又似一事，而在锡予，则融凝如一，既不露少许时髦之学者风度，亦不留丝毫守旧之士大夫积习。与时而化，而独立不倚，极高明而道中庸，锡予庶有之矣。

故锡予既不可谓是一佛学家，亦不可谓是一西方哲学家。既非擅交际能应世，亦非

傲岸骄世，或玩世不恭。锡予之毕生好学，劬劳不息之精神，则尽在其为人处世之日常生活中表现。徒读其书，恐将终不得其为人。徒接其人，亦将终不得其为学。锡予之为学与为人，则已一而化矣。余与锡予交，不可谓不久，不可谓不亲，惟所能言者，仅如此。（文中小标题和按语系编者所加）

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根到社会主义的实行”。比南社目标更明确具体，境界更高。至此柳“完全加入新文化运动了”（《南社纪略》）。

本年底，柳与老友陈去病等人创文酒之会——“岁寒社”，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于右任，以及邵力子、何香凝均为社友。以此砥砺气节。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改组。柳以同盟会会员的资格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党务活动，在吴江及江苏一带组党，为国民党江苏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

1934年底，组织上海市年鉴委员会，筹备年鉴出版工作。柳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此举实为我国编辑出版年鉴之始。

1935年11月10日，南社同人公葬社友陈去病于该社发祥地苏州虎丘，举行南社雅集，动议成立南社纪念会。12月，纪念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设于上海通志馆。柳被推为当然会长。

1940年12月，柳离沪赴港，英勇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洪流中。香港文化界人士举行欢迎茶话会，宋庆龄、许地山夫妇与焉。旋参加许地山先生组织的新文字学会。

1943年1月1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举行会员大会，柳被选为理事。越一年，桂林文协分会改组，柳仍任理事。

同年，南明史料纂徵社（即南史社）成立，柳为社长。

1945年5月，抗日战争胜利可望。柳在重庆与郭沫若、田汉等发起组织“革命诗社”，并为社长。该诗社以“爱纠民主歌手，创立革命诗社，配合时代，争取光明”

（见1945年《民主与科学》第1卷第9、10合期）为宗旨。

本年在重庆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本年11月，柳复与谭平山、李济深、马寅初等人创办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于重庆。

柳任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7年初，为积极争取和平民主之斗争，摆脱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柳再度离沪赴港，并与何香凝、李济深等积极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民革”于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成立，柳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1947年底，柳与宋云彬、钟敬文诸人组织“扶余诗社”（“扶余”即香港），柳任社长。后欲将该诗社扩大为“中国诗人协会”，未果。

1949年2月，全国解放在即。柳得毛泽东同志电，召其北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柳3月18日抵北京，以“民革”代表的名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柳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纵观柳亚子先生的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他从本世纪初的1902年拟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为止，在近五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亲身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这么一个“三部曲”的过程，他本人也走过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志士、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战士、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这样复杂曲折的人生道路。其间共发起组织和参加的社会团体凡二十二个，这在我国近代史上的确是罕见的。这些社会团体中，有以文学爱好为中心的文学团体，也有以砥砺民族气节为纽带的酒会雅社，还有以革命事业为出发点的党政派别。如此众多繁纷的社会活动构成了他全部生活的骨架。南社和柳亚子先生对中国革命所作的可贵努力，历史已有定论，毋庸赘言。但若要认真研究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可看作我们民族精神象征的人物一生艰苦跋涉的足印，领略他在这样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思想发展的轨迹，研究和了解上述曾在不同时期产生过较大影响的社会团体，实在是一项不容忽视的工作。